

# 《漢語外來詞詞典》序言

岑 麒 祥

漢語是我國漢族人民使用的語言。漢語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方言土語，但是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已形成了一種為全民族所通用的共同語——包括書面上的和口頭上的。這種共同語在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由於漢族人民和他族人民的頻繁交往，常同國內外的許多非漢語發生接觸，因此勢必導致在語言上互相影響。它一方面向其他語言提供了許多漢語詞語，另一方面又從其他語言吸收了好些語言成分。漢語中這些從別的語言吸收進來的語言成分就是漢語外來詞。

一種語言的外來詞，有的是從口語吸收進來的，有的是通過書面文獻接受過來的。但是，不管通過哪個途徑，外來詞一旦被吸收，就會經過一番改造以適應本民族語言的特點。漢語外來詞也不例外。改造的成分最明顯的表現在語音方面。漢語音節的構成比較簡單，語音系統也比較單純。遇到有些音是漢語所沒有的，就常用一個近似的去代替，例如把詞首的 l 和 r 都念成 l，把 v 念成 f 或 w 等等。有些複輔音是漢語的音節所不能容納的，就往往在每個輔音後面加上一個元音。加上元音後，如果音節過多，就把其中念得比較輕的予以省略，例如把梵語的 bodhisattva 譯成“菩提薩埵”再縮減為“菩薩”，把拉丁語的 Christus 譯成“基利斯督”再縮減為“基督”等等。有時候，詞形太短也容易發生混淆，於是就在它的前面或後面加上一個成分以資識別，如把英語的 car 譯成“卡車”，card 譯成“卡片”，beer 譯成“啤酒”，bar 譯成“酒吧”等等，而這就不只是語音的問題，還牽涉到構詞法的問題了。

外來詞有直接外來詞和間接外來詞之分。直接外來詞是由原語言直接輸送過來的，間接外來詞却是以另一種語言為媒介間接地吸收進來的，各依歷史條件來決定。如果表示同一意義的既有直接外來詞，又有間接外來詞，那就成了異形同義詞；加以漢字同音的很多，假如發音雖然相同，而傳寫時用上了不同的字，情況就更複雜。例如“身毒”、“信度”、“賢豆”、“痕都”、“天竺”、“天督”、“天篤”、“天毒”、“捐毒”和“印度”等都是指的那個地區或國家，可是“身毒”和“信度”來源於梵語的 Sindhu，“賢豆”和“痕都”源出於古波斯語的 Hendhu，“天竺”、“天督”、“天篤”和“天毒”來自古波斯土語的 Thendhu，而“捐毒”和“印度”却與拉丁語的 Indus 有關；“克里木”和“克里米亞”都是歐洲黑海北岸的一個半島的名稱，而“克里木”

譯自俄語的 *Krim*，而“克里米亞”却來自英語的 *Crimea*。同是一種久服會使人上癮、身體羸弱、遺患無窮的麻醉劑，而有“鴉片”、“阿片”和“阿芙蓉”等不同稱謂，那是因為“鴉片”和“阿片”譯自英語的 *opium*，而“阿芙蓉”却源出於阿拉伯語的 *af-yum*。這些都是由於來源的不同。

我國和日本有悠久的文化淵源。自公元五世紀後，日語通過種種方式從漢語借用了許多漢字，其中有一種所謂“訓讀”，字體雖然是漢字，而讀音却完全是日語的，跟漢字原來的讀音相差得很遠。明治維新後，日本人從西歐吸收了大量的科技術語，其中有許多就是用漢字來書寫的，而讀音却是日語的，與漢語的讀音大相徑庭。例如日語把佛拉芒語的 *gas* 念成 *gasu*，寫作“瓦斯”，把英語的 *yard* 念作 *yādo*，寫作“碼”，*concrete* 念成 *konkurito*，寫作“混凝土”，我們把這些詞吸收到漢語裏來，而讀音却完全按照漢語的念。這對漢語來說，實際上也是間接外來詞。

漢語外來詞以音譯的最為明顯，且最簡便。但是在一定情況下也有按照原詞的意義翻譯過來的。這在西洋語言學中叫做“仿譯詞”（法語 *calques*）或“翻譯借詞”（英語 *translation loans*），實際上就是按照原詞或詞組各部分的意義翻譯過來的義譯詞，例如把英語的 *Oxford* 譯成“牛津”，法語的 *tête-de-pont* 譯成“橋頭堡”，德語的 *übermensch* 譯成“超人”等等。義譯詞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懂得這些詞的各部分的意義，而且鑒定時能確實知道這些詞是由哪種語言的哪些詞翻譯過來的。西非洲有個國家叫 *Côte d'Ivoire*，按法語是“象牙海岸”的意思，英語叫做 *Ivory Coast*。拉丁美洲也有一個國家叫 *Costa Rica*，按西班牙語是“富庶海岸”的意思。這兩個詞的結構是相同的，可是我們把前者按照意義譯成“象牙海岸”，而把後者按照發音譯成“哥斯達黎加”。這可以表明我們對英語、法語的地名比對西班牙語的地名熟悉。有些屬於基本詞匯的詞，特別是有關自然界現象的詞，不同語言很可能有相同或很類似的說法。例如英國人把太陽的光綫叫做 *sunlight*，我們漢族人也把它叫做“日光”。這兩個詞的意義和結構完全相同，但是我們不能說英語的 *sunlight* 是從漢語借去的，也不能說漢語的“日光”是從英語借來的，因為它們都是獨立產生的。

漢語形聲字是漢字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途徑。許多漢語外來詞用漢字傳寫時也往往於聲旁之外加上個形旁，如“蒟蘿”、“苜蓿”、“茉莉”、“葡萄”、“琉璃”、“玻璃”、“鸕鶿”、“獅”以至“袈裟”等等。嚴復在他的譯書中，且曾為英語的 *bread*（麵包）創製了一個“𩚑𩚑”（其後並沒有通行）。直到現在，我國的化學工作者在為化學元素譯名時還死守着這個原則。他們總是把多音節的拉丁語名稱壓縮成一個單音節字來表示聲音，然後按照它們的性質各加上一個“金”旁、“石”旁或“气”旁作為形旁，如“鈞”、“矽”、“氫”等等。可是這樣一來，遇到發音相同的字就不好辦。例如“硅”本來譯作“矽”，後因與“矽”發音相同而改成“硅”，那可就與原詞 *silicium* 的發音相差得太遠了。

一般地說，漢語外來詞都是伴隨着某種外國或外族的事物或觀念被吸收進漢語的。但是我們不能反過來說，凡表示外國或外族事物或觀念的詞都是外來詞，因為我們對於

這些事物或觀念既可以依照它們的發音或意義加以翻譯，也可以根據它們所固有的某些特徵用漢語的材料為它們各定出個名稱來。比如歷史上的“西瓜”、“黃瓜”、“胡椒”、“洋蔥”、“白薯”、“袋鼠”、“斑馬”以至“長頸鹿”等等，都不能算作外來詞，（儘管這些東西都是由外國傳入我國的），因為它們無論是在發音上或意義上都跟原詞沒有關係。

漢語的外來詞，有的是音譯的，有的是義譯或音譯兼義譯的。音譯的也好，義譯的也好，如果違背了漢語的習慣，最後就會為自造詞所代替。例如英語的telephone按字面原是“遠的聲音”的意思，microphone按字面原是“小的聲音”的意思，我們起初把它們譯做“德律風”和“麥克風”，後來改稱“電話”和“擴音器”。“電話”和“擴音器”都是自造詞，與telephone和microphone的原意沒有關係。可是相反的情況也不是沒有的。例如英語的logic，起初我們把它叫做“名學”或“論理學”，後來改為“邏輯”，“邏輯”就是一個音譯的借詞。

自古以來，漢語外來詞的數量是相當大的，而且牽涉的範圍很廣。它是漢語發展史上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把這些外來詞搜集起來加以研究，不獨對漢語詞匯發展的歷史、音韻發展的歷史等方面的了解很有用處，就是對漢族和各民族間文化交流情況的研究也可以有很大幫助。漢語吸收外來詞的情況向來是很複雜的。本詞典只是搜羅其中比較特殊的拿來與原詞對照，並盡可能找出材料和例子來加以解釋，做些正本清源的工作。在編寫過程中，曾得語言研究所、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新疆大學和延邊大學部分同行和校內外的許多友好的大力幫助，他們或者提供材料，或者查對原詞，或者提出意見，為我們的編寫工作出了很大力量，謹在此致以衷心感謝。如發現缺點錯誤，尤望讀者和專家不吝提出批評指正，以便進一步改進。